

A 世界文明与地缘政治研究译丛
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Regions of Conflict



美国在冲突地区的 外交政策

〔美〕霍华德·J. 威尔德 著
陈媛媛 何克勇 译
何克勇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014038512

D871.20

114

A 世界文明与地缘政治研究译丛
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Regions of Conflict



美国在冲突地区的外交政策

〔美〕霍华德·J. 威尔德 著

陈媛媛 何克勇 译

何克勇 审校



北航

C1726534

D871.20

114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在冲突地区的外交政策 / (美) 威尔德著 ;
陈媛媛, 何克勇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3

(国际关系及地缘政治丛书)

书名原文: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regions
of conflict

ISBN 978-7-214-11720-5

I. ①美… II. ①威… ②陈… ③何… III. ①美国对
外政策—研究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9876号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St. Martin's Press, LLC, under the titl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Regions of Conflict by Howard J. Wiarda.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his this work.

书 名 美国在冲突地区的外交政策

著 者 [美] 霍华德·J. 威尔德

译 者 陈媛媛 何克勇

审 校 何克勇

责任编辑 王保顶 张延安

装帧设计 陈 敬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邮编: 065200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1720-5

定 价 32.00元



北航

C1726534

(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01403821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hinese Universities")

《世界文明与地缘政治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何克勇

副主编 徐鲁亚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何克勇 赵曙青 徐鲁亚 秦亚青 游 斌



译者的话

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真正走向世界，成为列强之一。115年来，美国经历了一战（尽管1917年4月才参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大的“热战”，又以各种方式间接参与一系列地区冲突，如中东战争。还与以前苏联为盟主的共产主义阵营进行了长达46年的冷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从一个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主导者。

今天，美国军事基地或据点从传统的欧洲向东欧、中亚延伸，其新一轮的战略布局正在亚洲紧锣密鼓地实施。

除了军事存在之外，从“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美国的政治影响在全球日益扩大。

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不言而喻。从中国到马来西亚到孟加拉国，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变成美国的加工厂，包括位于中国、生产iPhone、iPad的富士康，位于几大洲的波音飞机部件或组装基地，位于中国、印度、泰国等国的Polo服装加工厂，位于亚洲、南美的美国汽车制造厂……这些工厂为美国的老板干活，拿到大约20%的利润，而80%则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美国文化输出以各种方式在全球展开，而且大获其利。好莱坞的大片，迪斯尼的乐园，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餐饮文化几乎成为全世界的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你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去旅行，最常见的游客毫无疑问是说话肆无忌惮的美国人。

美国在世界上的这种无处不在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咄咄逼人、傲慢、到处干涉内政、霸权、经济侵略、资源掠夺，因此引来不少骂声。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1994年卢旺达爆发大规模的部族仇杀，数十万人遇害，美国因未能及时干预而遭受到非洲国家唾骂。非洲人当时问：“难道几百名美国士兵的生命比几十万黑人的生命更重要？”人虽不是美国人杀的，但克林顿总统还是赶到卢旺达，为未能及时干预而致歉和谢罪。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页岩油气的开采，美国已跃升世界第一油气生产国。

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为什么要到处出头？为什么有的地方美国进行干涉而有的地方又不干涉？

平常我们听到的不少关于此类问题的回答，有的甚至是专家的回答，往往流于简单，流于感情用事，缺乏严密的逻辑，缺少事实的佐证，不能令人信服。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缺乏对美国真正的了解。

近年来，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趋势，使得学术界的政治研究与真正的政策制定渐行渐远。第一个趋势是，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华盛顿越来越多智库的出现，学术界逐渐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另一个趋势是，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开始越来越依赖各种数据，量化研究和时髦的数学建模开始大行其道，这种“科学化”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已然成为主流。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缺乏对对象国的历史、地理、文化、语言等真实情况的把握，结果根据这种方法制定的外交政策使美国目前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和歧途。针对美国外交政

策制定中的时弊，霍华德·J. 威尔德写了专著《美国在冲突地区的外交政策》。

威尔德是乔治亚大学国际关系系的主任、拉斯克讲座教授，同时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高级研究员、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高级学者、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现为魏海德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他曾在马萨诸塞大学任伊比利亚与拉丁美洲研究霍尔维兹讲座教授、美国国防大学安全政策教授、国防大学半球防务研究中心顾问、《安全与防务研究评论》杂志的主编。同时他在华盛顿的智库及外交政策制定部门工作了30年。在外交政策、比较政治学及国际关系领域他既是教授，也是研究员、咨询专家和政府顾问。

威尔德教授最初专治拉丁美洲政治，他对拉丁美洲、西班牙、葡萄牙比较政治学、社团政治、政治文化及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在美国学界享有盛名。后来，他的研究兴趣扩大至俄国、中欧、东欧、亚洲、西欧、撒哈拉以南非洲、波斯湾。他深入上述地区进行大量的调查、观察。他编写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被广泛引用，在拉丁美洲研究方面被誉为美国“最具影响的”五个学者之一，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被认为是美国顶尖的20个学者之一。他曾给四位美国总统和各类私募基金会、联邦政府、大公司任咨询专家和顾问。

威尔德博士著述颇丰，编辑了100多本书，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及国会证词。他的著作包括：《破碎的政府》（Broken Government）、《全球化》（Globalization）、《美国的外交政策》（American Foreign Policy）、《关于周边的发展》（Development on the Periphery）、《比较政治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欧洲的政治》（European Politics）、《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发展》（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Nations）等。其中许多著作已译为多种文字，包括汉语。

在职业生涯中，威尔德一直倡导以学术研究指导政策制定的方针，推崇以科学研究的第一手详实资料，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帮助。《美国在冲突地区的外交政策》即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思想。

该书于2011年出版，属于美国《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丛书（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之一。威尔德力图通过自己的力作来重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的联系，使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学重新为政策制定所用。他认为，只有在充分了解了对象国的历史、地理、文化、语言等情况，才能制定出合理、有据、有效、可持续的外交政策；比较政治学和区域研究的成果必须重新为政策的决策过程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本书按地区划分，分别讨论了世界主要的国家和地区，按章节依次分为：东欧、西欧、俄罗斯、亚洲、中东、拉美、非洲。作者在每一章中，先描述地区的概况，重点介绍地区的发展状况和经济水平，随后分析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利益之所在，并为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在每一章的结论部分，作者按照地区国家的重要程度，针对重要国家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关键问题，具体而详尽地讨论美国外交政策在这些国家应该注意的问题。

用一本字数不多的小书把美国所关注的地区与国家的关键状况与问题以及美国在这些地方的根本利益勾勒得如此清楚，又如此全面，实属难得。从实用的角度看，这本书可以为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美国在世界各地利益、政策重点提供一个线索，更可以解答我们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所作所为的一些疑问。从学术的角度看，非常学术的问题原本可以用不那么令人生畏的术语和不绕弯子的方式说得清清楚楚，从而让学术圈外对美国外交政策感兴趣的读者感到够得着、抓得住。这里，我们看到了大师风采。

新世纪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而老问题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新变化。环境、能源、气候、恐怖主义、核问题、种族冲突、经济全球化等问题，为各国的外交政策的有效制定提出了新的挑

战。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将这本《美国在冲突地区的外交政策》翻译出版，是必要而有意义的。从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外交政策执行的问题和困境，可以了解到美国在面对新世纪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各种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和措施。对于我国的读者而言，也可以更近距离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情况，这也是翻译此书的意义所在。

本书属于由何克勇教授、徐鲁亚教授主持的中央民族大学重大科研课题“世界文明与地缘政治研究译丛”之一。本书的翻译工作由陈媛媛、何克勇完成，初稿由陈媛媛完成，全书的第2、3稿由何克勇完成。翻译中，我们遵循“翻译即译意”的原则，力图再现作者的原意，同时尽可能贴合原作的语言风格。

我们希望，这部著作能够像原著那样，为研究美国的学者、与美国打交道的外交官、对美国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有价值、有启发、有意义的信息。然而，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批评指正，诚为所求。

何克勇

2013年11月于北京莲花斋

总序

当今世界热点地区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到民族（族群）问题和宗教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今世界的难题，被称为两大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许多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常常受到这两个问题的撕扯，尤其是前苏东地区、中东地区和非洲一些地区更是备受困扰。宗教和民族是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中的重要因素，宗教对抗引发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加剧宗教对抗，从而引发地区冲突。这些冲突无疑给世界文明带来震荡和冲击，而宗教极端主义一旦与国际恐怖主义联姻，这种震动和冲击将是毁灭性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第三次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世界民族问题逐渐与全球化过程、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民族国家建构、跨境民族、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以及国内族际关系等产生了共生、纽结和镶嵌关系。世界民族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多样性等特征，包括民族国家关系（国际关系）、多民族国家内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跨境民族问题等等。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民族关系史，也具有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解决我国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但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下，我国的民族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翻译、介绍和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是研究民族事务不可或缺的参考，把国外民族事务的国际经验与国内的民族政治事实结合起来，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民族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在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走出去”战略正在稳步得到实施，通过学术、教育、文化和商贸等，国人正以各种方式走出了国门。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2012年中国出境旅游的人数达到8300万。另据估计，中国在海外的各类企业总计已达到3万多家。

今天，每当我们打开电视机，往往会听到许多关于热点事件的新闻报道。许多事件，无论发生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无论是令人悲哀的结果还是让人尴尬的过程，似乎总会涉及到我们中国人。从泰国、吉尔吉斯斯坦、利比亚局势骤变而引起的大量紧急撤侨，到俄罗斯驱逐大量中国工人或关闭华商集市；从24名中国公民在印度尼西亚东部海域沉船丧生事故，到华人在北美洲遭遇124起抢劫事件；从多次发生在阿根廷的华人超市遭武装抢劫，到29名中国员工遭苏丹反政府组织劫持，我们看到，几乎在世界各地，涉及中国人的事件日益增多。

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不禁会问：东欧、非洲的警察为什么总喜欢找中国人的茬？俄罗斯为什么几度驱逐中国商人？中国在非洲无偿地援助了那么多的建设项目，为什么还被指责为“新殖民者”？每年数千万的中国游客为欧洲、美洲带去如此巨大的收入，甚至为他们支撑起因经济衰退而疲软的旅游市场，为什么还得到不文明、不受欢迎的名声？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像美国一样在很多地方成为被仇视、嫉恨的对象吗？美国有学者承认，美国人并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国外。那么

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对外国了解吗？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许多遭遇和尴尬正源于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或全然无知或一知半解或以己度人。

为了借鉴国际学术界在民族、宗教与冲突方面的研究经验，深入了解他者的研究视角、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为了给“走出去”的国人提供一些系统而有效的信息，我们以“世界民族关系与问题研究译丛”为题申请了“中央民族大学重大科研项目”资助，并获得了批准。

针对书目的选择和确定，我们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后来发现，我们所选择书目已超出了“世界民族关系与问题”的范畴，因此，最终将译丛的题目定为《世界文明与地缘政治研究译丛》。

最后，我谨代表本译丛编委会的所有成员，衷心感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领导，是他们的独具慧眼，使本系列丛书得以付梓出版。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挚友杨建国先生，是他向我们推荐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同时还要感谢在整个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对本译丛做出过巨大努力和辛勤劳动的各位朋友。

何克勇

2013年12月25日于北京莲花斋

编者按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改变，而且仍在不断变化。过去40多年来，美国在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运筹帷幄，排兵布阵，遏制苏联，并最终打败苏联。1991年，强大对手苏联解体，改变了国际关系，也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世界两极对抗终结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抗的结束更开启了愈发复杂、愈发动荡、愈发难测的21世纪。

VII

美国现在面临一系列挑战。除了那些看似传统的国际事务以外，华盛顿一直在思考许多强大对手东山再起这个问题，比如崛起的中国、复兴的俄罗斯、自力更生的欧盟。不断崛起的地区性大国，如印度、伊朗、巴西等国家，使得全球局势更加复杂，而这在冷战时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不仅如此，我们与巴基斯坦、委内瑞拉、朝鲜、墨西哥等国的双边关系也很重要，而且问题重重。在过去的年代中，这些国家几乎从未进入美国国务院的雷达监测范围，而且这样的国家还有很多。中东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前景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愈发渺茫，这就给阿富汗和伊拉克持续的动荡局势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

我们现在所处的新时代也有一些新的问题，或者说是旧事重现。恐怖主义、海盗问题、种族冲突、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核扩散、能源需求、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法在一系列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这些问题（还有这里未列出的其他问题）都需要我们关注和引导，或提出解决办法。

VII 本书意识到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已经发生转变，与此同时，强调外交政策不能孤立地看待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还必须关注其他新问题的复杂性。本书力求揭示美国对新的现实所做出的反应，面对21世纪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美国如何应对，抑或应该如何应对，正是本书的中心议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托马斯·亨利克森

序

我的学术生涯始于1965年。那时我是一个比较政治学学者，专攻拉美问题。我和我同时代的学者当时的目标是在拉美地区获取专门知识或地区研究的专门知识。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浸泡在政治科学和拉美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语言、文化之中。我们当时的设想是，通过我们的专门知识，启迪并改善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 IX

和平年代，美国根据对象国或地区全面的第一手资料来制定外交政策。在和平的年代，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提出新的边疆政策，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实施伟大社会的政策，美国提出了激动人心的新外交政策倡议，比如和平队、进步联盟、国际开发署。这是1960年代，是“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方兴未艾”的年代，也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紧密联系的年代，因为我们使出浑身解数去理解刚诞生或新崛起国家这个现象，以及这些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的重要作用。

在那个年代，政策制定者通常都会向学术界寻求知识和建议，而身处学界的我们则（也许有些天真地）期望政策制定者能够广泛阅读和利用我们的研究结果。当时，从学术角度分析发展问题与促进不利地区发展的政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假定的前提，

X 即学术及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专门知识可以为公共政策提供资讯。曾几何时，我们这些研究者对政策制定还真产生过影响。

但是后来几件重大事件的发生，使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之间的紧密联系变得十分紧张，形同水火。

一、越南战争使得学术界——特别是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与约翰逊政府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因怀疑大部分学者都是民主党人，所以截断了许多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和研究项目。

三、华盛顿特区兴起了一些专业的智库和更为专门化的研究和政策团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而且不断壮大。结果，与政策有关的建议开始主要从这些机构获得了，而不再从美国的大学获得。

四、由于越南战争旷日持久，加上水门事件，尼克松尽失颜面，学术界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政治化，终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

五、与此同时，政治科学领域，包括其两个子领域：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量化研究，注重数学方法，注重研究的“科学性”。政治科学开始像经济学那样，更关注时髦而又抽象的数学建模，而不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

到1980年，在学术界干了15年之后，我对当时的政治科学，甚至是整个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十分不满。1979年至1981年间，我在哈佛大学著名的国际事务中心（现为魏海德国际事务中心）担任外交政策专家。1981年，我又被召唤到华盛顿，在智库/政策领域工作了20多年。直到2003年，我才接受了一所顶尖大学的邀请，担任其国际关系专业教授，并出任该校全新的国际事务系的主任，算是重新回到了全职的学术生涯。

XI 在离开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回到学术界，回到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着实有些令人震惊。我并不想夸大其中的变化，因为仍旧有

许多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出色研究和写作在美国的大学里开展，只是该学科明显在向别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对这些方向做一定的了解。首先，国际关系领域，就像整个政治科学一样，变得更加注重“科学性”，从而把偏定性研究和阐释性研究的观点排斥在外。第二，由于强调理性选择、数学建模和研究方法本身，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过去为制定政策提供资讯的理念。第三，为了提倡研究者获取可测量的“数据集”，文化、历史、地理、语言、区域研究等无不遭到贬损。而这些“数据集”在科学性方面的优点通常令人生疑。第四，制定政策与学术界之间的关联已经明显斩断，而且这两个领域发展的方向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异，即使两者之间还存在联系，那也微不足道了。

我认为这些发展趋势很危险，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也是错误的。这也是本书关注的核心所在。我想看到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重新恢复联系。其次，我想在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及与政策相关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第三，我认为应该恢复历史、地理、政治文化、区域研究等研究因素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原有的正当地位。第四，在我们考虑世界不同地区的外交政策时，我希望看到这些因素融入我们的谋虑之中。

我逐渐发现，华盛顿制定外交政策时也出现了许多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同样的发展趋势。这些发展趋势表明，从间谍卫星、先进的监听设备等渠道获得的数据迅猛增长，而且这些趋势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部等部门十分明显。相比较而言，这些趋势在国务院的表现反而不那么明显，尽管国务院的方针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会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些发展趋势包括：建立数学模型以排斥更加诠释性的研究；使用量化研究的方法，不再考虑地理、文化、历史等因素；解释数据时，不再认可全面掌握关于地区、国家、语言等专业知识的必要性。我深信这些发展趋势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世界许多地区都陷入歧途，因为我们不掌握或不会说我们所应对的国家或地区的

XII